

陈铁民 著

社会发展理论模式研究

兼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会发展理论模式研究

——兼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

陈铁民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会发展理论模式研究
——兼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
陈铁民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厦门新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莲前北路 77 号 邮编:361009)

*

开本 850×1168 1/32 11 张 276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册

ISBN 7-5615-1416-1/C·28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它涉及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始终是困扰着人类的重要理论课题,但明确提出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问题并系统地进行讨论,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独立了的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不发达国家提供资源和市场,但亚非拉一大批国家由于经济落后,难以满足其要求。不发达国家的停滞不前,势必拖发达国家的后腿,所以二战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发达与不发达关系的研究,把发展作为理论热点,各种发展理论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以刘易斯为代表的经济增长论,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以佩鲁为代表的新发展观即综合发展观,以及以弗兰克、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等等,模式不断更迭,新模式否定、修正旧模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但往往因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又陷入困境,引出新的争论、探索。应该肯定,每一种新模式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的深入思考、研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思想材料。经过西方学者几十年艰辛的探索,不断转换视角,从物到人,把人的发展确定为发展的根本目标;更新观念,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综合发展;突破欧洲中心论,强调发展的多样化;研究发展与代价的关系,探索发展的负效应……,终于达成可持续发展观的共识,并成为不发

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模式的正确选择。从总体上说,其演变趋势愈来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但由于其理论局限、缺陷以及种种社会原因,在实践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延误或受挫,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同样,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探索、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晚年,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继续深入研究,并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继续进行深入探索,提出许多卓越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列宁早逝,他的思想未能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贯彻下去。

二战后,时代主题转变,世界新格局形成,对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态势,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新问题,人们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但没有获得正确的认识。例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探索,没有能够正确回答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实际问题,没有发现、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端,因而不能克服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这一模式的弊病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终导致前苏联东欧西化分化。在中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等著作中,作了极其有益的探索,对我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为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但由于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原先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探索,因而也没有解决好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思想,从而把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来说,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的主题。邓小平的发展观是辩证的整体的发展观,它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协调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持续的、综合的发展观,其内容十分丰富、深刻。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只就“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与起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体制模式、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波浪式前进的经济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发展理论中的辩证思维方式方法这七个主要问题作扼要阐述,以期如实反映邓小平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不是孤立地阐述邓小平发展理论,而是结合二战后所出现的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模式和现代化模式,通过比较分析来阐述邓小平发展理论,揭示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本书不同于其他有关邓小平发展理论的论著的特点。

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和实现现代化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课题。这本著作只是作了初步的肤浅的探索、讨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封建主义遗毒与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现

代化进程受挫或延误,同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遗毒的干扰、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社会沉浸于文化汪洋大海之中。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其传统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正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断侵蚀我们党的机体。在我们党内长时间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把领袖人物神化、滋长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等现象。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竟然还要坚持“两个凡是”,其实质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继续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神化,以领袖人物的是非为是非,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家长式领导作风、干部终身制、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都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的表现。它使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违背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封建专制主义、封建意识形态不仅侵蚀、影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而且还影响我国制度的完善。邓小平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

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①“‘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②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制度、体制,都受“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其后果是破坏民主法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像斯大林那样个人专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笔者认为,在我们党内长期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领导者“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党和国家却难以防止和制止”的这种现象,在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家同样也不可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的那种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它有力地说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仅要抵制、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而且要继续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并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使广大干部群众彻底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批判、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但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批判不能代替和掩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肃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之一是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有时会落后于社会存在,并阻碍其发展。今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了,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却不会立即随之消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存在,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封建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

专制主义的遗毒无声无色、不知不觉地渗透入人们的头脑里,并可能成为人们认识结构的组成因素,影响、干扰着人们的正确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人们不自觉地从小自己的头脑里和认识结构中肃清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遗毒,那么它就会干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就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原来的面貌去理解、解释马克思主义,甚至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例如: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者自以为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其实是从封建专制主义、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忠君”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一个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如果不自觉地肃清自己头脑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从而也就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甚至可能成为阻力。改革开放至今已20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有些人站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用“左”的眼光看改革开放,把它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斥之为搞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左”的观点与封建主义、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者习惯势力遗毒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阻力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每个人充分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民主、人权应该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民主、人权是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包括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先烈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

仆后继,用鲜血生命去追求的奋斗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人权却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武器,这是极不应该的、极不正常的。当然,这同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这一点有密切关系。用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是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一个表现,社会主义应该建立比资本主义更进步、更完善、更切实的民主法制。遗憾的是,从 50 年代开始,我国法学界却是“左”祸的重灾区,不少法学界人士被打成右派,检察院、监察部被撤销,律师制度自行“消亡”,“人权”、“法治”、“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法制”等法律的基本范畴,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视为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资产阶级工具。这是因为有些领导人主张以人治代替法治,似乎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治人,法律不能治人。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民主法制的“左”的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最高指示”就是最高法律。民主与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反之,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法制。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民主集中制遭受破坏,就是以人治代替法治的严重恶果,其实质是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家长制残余的表现。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头脑里存在封建主义家长式观念,不是把领导理解为服务、领导者理解为人民公仆,而是处处以“家长”自居,把下属、人民视为只能唯命是从的子女,而唯命是从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孝道、报恩,这就势必侵犯人权,破坏民主法制,不愿接受人民的监督,甚至会把自己主管的单位的公共财产占为己有,或为自己的亲属朋友侵占公共财富提供方便。腐败现象的滋生、发展与这种封建专制主义意识死灰复燃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干部利用职权之便贪污贿赂而成为暴富,任其发展,必将蜕变为带有封建性的社会群团、社会势力,而成为深化改革、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阻力。

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

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① 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小生产习惯势力是“左”的思想根源之一。正如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会断送社会主义一样,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同样也会断送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所以,我们在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批判肃清,更要警惕有些人站在封建社会主义立场上,打着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帜来复活、传播封建专制主义意识。不发达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沉积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它们是实现现代化的阻力、障碍物。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不能盲目搬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但必须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文化成果。如果不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就不能自觉地去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势必延误现代化的进程。

2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是批判“两个凡是”,是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政治思想的深层来说,“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坚持个人迷信、封建主义家长制和忠君思想,是反对民主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两个凡是”的目的就是要使干部群众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禁锢、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还未完成,有待我们继续努力。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我国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民主法治以及顺利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是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共同面临的课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发展理论模式是极其丰富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本书侧重于探讨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模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当代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	(1)
一、19 世纪以前的社会发展思想	(1)
二、19 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奠基人	(8)
三、西方古典社会发展理论模式	(16)
第二章 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模式演变的第一阶段	(40)
一、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	(40)
二、经济增长论	(47)
第三章 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模式演变的第二阶段	(57)
一、增长极限论	(57)
二、以佩鲁为代表的综合发展观	(60)
三、不发达理论	(75)
第四章 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模式演变的第三阶段	(99)
一、可持续发展观的酝酿和形成	(99)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原则	(104)
三、可持续发展是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选择	(112)
四、发展知识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117)
第五章 未来学社会发展理论模式	(121)
一、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123)
二、托夫勒的浪潮文明观	(134)
第六章 马克思、列宁关于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	(157)
一、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特征的探索	(157)

二、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	(165)
三、列宁的探索和创新	(184)
四、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198)
第七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205)
一、中国社会往何处去	(205)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构思和探索	(209)
三、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221)
四、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 ..	(229)
第八章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一)	
——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236)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236)
二、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244)
三、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起点	(254)
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体制模式	(264)
第九章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二)	
——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277)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277)
二、经济发展规律——波浪式前进	(287)
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辩证思维方式方法	(295)
第十章 现代化理论模式比较	(307)
一、当代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模式的演变趋势 ..	(308)
二、当今世界现代化模式比较	(320)
三、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	(326)
后 记	(336)

第一章 当代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19 世纪以前的社会发展思想

人们通常把社会发展理论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兴起的新理论,其实并不然。社会发展涉及各国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始终困扰着人类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社会发展问题。哲学史上许多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和《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等等,都对自己时代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道路、战略、策略进行了理论阐述,至今还影响着当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

古代西方较系统的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是由柏拉图率先制定的。他在《蒂迈欧篇》中把人类历史截然区分为两大阶段,其分水岭是大洪水。在大洪水之前,由于造物主的支配,雅典是各城邦中最大最好的城邦,实行最佳的政制;后一阶段由于神、造物主的支配日益松弛,于是洪水从天而降,淹没了一切,留下来的只是愚昧

无知的人,于是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是一种宿命论的循环历史观。亚里斯多德写道:“人类的事情以及其他具有自然运动和生灭过程的事物现象都是一个循环。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时间里被识别的,并且都有它们的终结和开始,仿佛在周期地进行着,因为时间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循环。”^① 这是从世界观高度对当时循环论的社会历史所作的概括。

柏拉图社会发展观除了神学目的论和历史循环论等糟粕外,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因素。柏拉图注意国家的发展问题,在《理想国》中,他对当时奴隶社会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理想国的蓝图,试图以此挽救走向衰落的希腊城邦奴隶制。他对国家政治制度、阶级结构、所有制、家庭婚姻、教育、法治等作了探讨,力图从经济、社会分工寻找国家的起源。他认为,私有制是造成“彼此仇恨互相计算”的根源,是引起阶级分化的原因,因此,他倾向于“土地和收获都归公有”。^② 在《国家篇》中,他提出公道的立国原则,认为一个理想的和谐的社会是“每个人应当只做一件适合他的本性的事情”,“并且是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干预别人的事情”。柏拉图关于社会起源、社会发展动力、消灭阶级等主张,对于后人社会发展理论具有积极的影响。

亚里斯多德也很注意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从时间上讲,国家是在家庭的基础上产生的,家庭的繁集构成了村落,村落的联合就形成了国家,但是,从性质上看,国家并非家庭和村社的机械总和,国家高于个人、家庭、村社。他赞扬中等阶级拥有适度财产,“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公民阶级”,^③ “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④ 在他看来,这样的政治制度

① 亚里斯多德:《物理学》223b6~29。

②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263b6~7。

③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4卷第11章,载《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8页。

④ 同上注。

有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中世纪,奥古斯丁的《天国》一书表达了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发展思想。他反对古代哲学家的循环论观点。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家认为,发展是循环进行的,社会实体的自然发展顺序是生长——全盛——衰弱,反复循环,周而复始;而基督教发展论则认为,生长和衰弱不是不断重复的,而是单线的。就人类而言,这一循环始于亚当,进而是救世主降临的全盛时期,最后是世界趋于毁灭。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根据上帝创世说,把人类社会分为七个时期,即婴儿时期、儿童时期、青年时期、成年期、壮年期、拯救期、终结期。奥古斯丁的社会发展观包含着线性进展的思想,影响着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经过了文艺复兴,尤其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基督教的社会发展思想受到了冲击而被近代的社会发展理论所取代。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和康帕内拉(1568—1639)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反映了早期无产者对社会发展的理想。莫尔于1516年出版了《乌托邦》,抨击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把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比作“吃羊的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在论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曾两次引用这些论述。莫尔认为当时人民的痛苦、灾难是由圈地运动造成的,他认识到私有财产和财产的快速积累是社会一切灾难、罪恶的根源,因而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提出了一套废除私有财产之后如何组织生产的方法,提出一种比较完善的国家方案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莫尔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以手工业为基础实行公有制,所有成年人,除担任公职和从事科学研究者外,不分男女,都参加生产劳动,没有固定的农业人口,每人都要轮流参加两年的农业劳动;一切产品归社会所有;每天工作6小时,空闲的时间可以从事科学和艺术等活动;公职人员由选举而产生,国家依据民主原则实行管理。莫尔的理想社会还保留着奴隶和宗教。当然,莫尔既